

一封《新民晚报》老社长赵超构写于1985年的珍贵回信，透过张宝林先生的细致解读、历史钩沉，折射出几位文化老人饱经沧桑后的绵长友情与敏锐智慧。——编者按



▲ 赵超构先生

给高集的信  
赵超构

# 赵超构为什么「少说为佳」——读赵超构致高集的一封信

◆ 张宝林

赵超构十四日

这是上海《新民晚报》社长赵超构写给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高集的一封信。落款时间只有日期，没有年份和月份，信封上的邮戳，也模糊不清。年份好办，很快认定是1985年。但究竟是几月？却费了一些工夫。我开始以为是7月，因为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是7月1日正式出刊的。后来，给《新民晚报》李天扬兄看过本文初稿，他说应是6月。理由是：“华老逝于6月12日；而且，上海6月是黄梅天。7月，就是酷暑了。”他还认为，赵超老评价的这份（或几份）海外版，仍是试刊，他是说后期试刊比先前试刊有进步，不是和正式出刊作比较，正式出刊，就不必寄了，说的有道理，采纳他的说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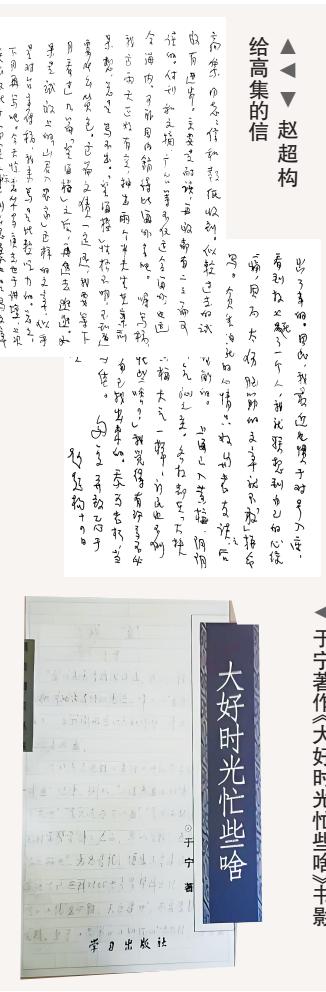
## 二

我的岳父高集（1920—2003），是资深报人，早年在《大公报》担任记者、采访主任、驻京办事处副主任。1949年2月，天津《大公报》改组为《进步日报》，高集任社务委员兼编辑主任。1950年4月，由范长江介绍到《人民日报》工作，历任文教组副组长、政法组副组长、西部副主任、国际部副主任。1985年，海外版筹备期间，和谭文瑞、余焕椿、徐麟同任领导小组成员。1985年7月1日正式出刊后，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，负责言论和副刊，直至1988年离休。

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筹备期间，高集曾亲赴上海，召开座谈会，并登门拜访，动员上海的老朋友

们为海外版写稿。赵超构是高集的几十年的旧友，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就很熟悉。虽然赵超老当时已年过古稀，也受到邀约。报纸每次试刊，高集都给赵超老寄样报征求意见，并请这位名满天下的老报人赐稿。这封信，是老人家收到第二批试刊后的回信。其实，我岳母高汾，和赵超老更熟，还两度是他的老部下。重庆时代，她就是《新民报》记者。当年与浦照修、彭子冈，都是活跃在大后方的新闻界女杰。1949年后，历任《大公报》《中国财贸报》《经济日报》记者、编辑。1986年退休后，她又归于赵超老的麾下，被陈铭德、邓季惺伉俪，礼聘为上海《新民晚报》的驻京办事处主任兼编辑、记者兼办事员。那时的驻京办就高汾一个人。因为她的杰出贡献，她成了《新民晚报》的终身荣誉职工。所以，赵超老在信中，专门附笔“致意”。

他们虽天各一方，但联系从来



于宁著作《大好时光忙些啥》书影



▲ 高汾（左）和赵超构

未断。除了书信往来，还多次见面。每次赵超老来京开会，高集高汾都要去住处探望，还会约上几位老友一起下馆子小酌几杯。

## 三

赵超构，笔名林放，《新民报》元老，浙江省文成县人。民国时期就是著名报人。1949年后，除了继续担任《新民报》社长，还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，是文化界著

▲ 前排左起:邓季惺、陈铭德  
后排左起:高集、高汾、郁风、钱辛波、吴祖光

名的社会活动家。

赵超老的高光时刻，是1944年的那次著名采访。他参加记者团访问延安，随后撰写了十几万字的长篇通讯《延安一月》，在重庆和成都的《新民报》连载，当年11月出版了单行本，后来，又再版、三版，轰动一时。这本书由陈铭德、张恨水作序，成了赵超构的代表作。正如陈铭德在序言中所说：“更使我们满意的，是作者具体的提供了一种立言的态度。对于延安事物，虽然有时是介绍，有时是批评，但自始至终，看不到有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。”

赵超老集报人、作家、社会活动家于一身，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却是他的杂文。他从1943年开始在成都《新民报·晚刊》开辟《未晚谈》杂文专栏，一直持续到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，一直没有停止杂文的写作。

《未晚谈》是他的专栏，也是他的名片。他一生写政论、杂文近万篇，绝大部分是杂文。他的杂文，卓然不群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。篇幅短小，酣畅淋漓。读他的杂文集，令人想起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里的话：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。”举凡政坛风波、烽烟战事、万邦动态、市井琐闻，无不入其法眼，而发为评论，皆中肯綮。

## 四

高集无疑是想借助赵超老的这支椽笔，为新创刊的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增光添彩。但是，1985年的赵超老，已然75岁高龄。他会答应吗？

让我们仔细看看赵超老这封信是怎么说的。

开头说了些客套话，接着，他说写些什么，还没有考虑好，但答应“文债一定还”。下面的文字有点伤感。他举了几个例子，华罗庚、关在汉、刘思慕这几个老人匆匆离世，都与劳累有关，他不得不有所顾忌，“太伤脑筋的文章就不‘敢’拼命写”。接下来的话就很有意思，足堪细品。接着，他提到了《人民日报》一篇文章——《大好时光忙些啥？》，这是篇什么文章？我决定做一番考证。

先查了百度。没有找到关于这篇评论的出处。但意外发现，我的研究生同学——做过《人民日报》评论部主任、后来升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的于宁出过一本书，书名正是《大好时光忙些啥》。这本书于1997年10月1日出版，是一本理论随笔集。我猜想，既然书的著者是于宁，书名又是《人民日报》的那篇评论，那么，这篇评论的执笔者一定是于宁兄。

于宁兄长我几岁，身体也不太好，所以，我请原报社的一位

同事，也是《人民日报》报史研究专家祝华新帮我检索一下。他很快反馈，刊发时间是1985年5月30日，版次是头版重要位置。

## 五

评论文章不长，680多字。主题正如标题标示，是对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工作作风的语重心长的问询和提醒。

这篇文章，态度温婉，语气和顺，并无疾言厉色，指出的问题也不涉政治立场、态度，不过是一般的批评。请看下面几段文字：

“……有的同志却是另一种‘忙’：忙于开各种不解决问题的会议，忙于搞不疾不痒的文件，忙于参加各种‘内幕活动’，忙于部署应付检查、参观的表面文章……

“他们有效地利用时间，还是无谓地耗费时间，都会影响成千万人。

“在改革中，各种实际问题、政策问题、思想问题纷至沓来，迫切需要正确解决。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加强责任感，改进工作作风，跳出‘文山会海’，深入实际，认真研究，慎重决策。

“让我们翻翻自己的记事簿——忙了些什么？成效怎么样？再查查今后的日程表——准备忙些什么？其中哪些事需要增加时间、多花气力？哪些事应当减少时间、甚至免掉？”

很明显，评论是批评那些主观主义、形式主义，不愿动脑筋解决实际问题，只想偷奸耍滑做表面文章的作风。这些毛病，其实并非只是干部队伍的主要问题。即便如此，这些问题也并非小恙，而是痼疾。试看，从上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开始，到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，党和政府发布过多少文件，反对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。

## 六

想来，赵超老对此必有深切体察。1957年“大鸣大放”前后，他写了一百多篇针砭时弊的杂文，有的比较温和，有的则很激烈。其中《先峰何在》，批评新闻界缺乏敢于直言的先锋。毛主席念旧情，保了他，使他幸免于难。但“文革”爆发，他这个“漏网大右派”挨整多年。

文章引起赵超老慨叹，他说，我觉得有许多不必要的“忙”偏是自己找出来的。后面，是这封信的最后一句：“忝为老朽，当然以少说为佳。”

赵超老不想说了。是的，他说了一辈子，不想说了。依然是《未晚谈》的笔法，不必说穿，点到为止。

最后，回到开头约稿的问题：赵超老践诺没有？他给“望海楼”写文章了吗？

可以肯定的是写了。多年前，我为写岳父母的传记，查过那几年的报纸，在“望海楼”专栏作者名录中有赵超老的名字，但是，究竟写了什么，当时没在意。现在想查，却大不易了。一些老朋友说，查阅手续非常繁杂，最后无果而终。